

我国工商界 的变迁

秦力著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重点图书

华文出版社

DG29/125
1

DG29/125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丛书

我国工商界的变迁

秦 力 著

·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国工商界的变迁/秦力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9. 9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丛书/何理主编)

ISBN 7-5075-0938-9

I. 我… II. 秦… III. 统一战线工作-成就-中国
IV. D 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0069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 (010) 63096781 (010) 66063891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京东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6·875 印张 16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出版前言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之际，我们组织编撰了《新中国的统一战线》丛书。这套书，系国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重点图书选题”。

50 年前，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团结各民主党派，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打败了嚣张一时的国民党军队，胜利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创建了新中国。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紧紧依靠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斗不息，取得了为世界人民所瞩目的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成为推动统一战线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制定和完善了党的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一步开创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50 年来，尽管中国的统一战线也曾出现过波折，走过弯路，但是，实践证明：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没有一个包括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不

可能的。

这套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建国 50 年来统一战线的风貌和历史经验。在历史即将跨入伟大的新世纪的时候，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爱国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第一章 利用、限制：民族工商业的新生

一、建国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状况	(1)
二、新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政策	(7)
三、扶持民族资本	(11)
四、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	(13)
五、调整工商业	(19)
六、组织“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 的“五毒”行为	(25)

第二章 全国工商联的成立

一、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商联的统一战线政策	(31)
二、筹建全国工商联	(35)
三、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41)

第三章 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45)
二、“利用、限制、改造”	(51)
三、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和平赎买	(55)
四、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 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	(59)
五、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63)
六、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66)
七、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68)
八、改造步伐的加快	(76)

九、“团结、教育、改造”	(81)
十、成就和问题	(91)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工商界的统一战线

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形势、新任务	(97)
二、中共中央对工商界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	(100)
三、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105)
四、“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07)
五、民主座谈会上的“争论”	(112)
六、1956年底毛泽东与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	(115)

第五章 血与火的考验

一、反右斗争扩大化及其对工商界人士的伤害	(119)
二、工商界的“神仙会”	(127)
三、适应国民经济建设需要，调整与工商界的关系	(131)
四、“文化大革命”对工商界的摧残与迫害	(134)

第六章 粉碎“四人帮”，恢复对工商界的

统一战线政策

一、民建、工商联恢复组织活动	(142)
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	(146)

第七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工商界政策的

全面落实

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49)
二、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大变化	(151)
三、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153)
四、全面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	(157)

五、落实区别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的政策 (162)

第八章 新时期对工商界的统一战线

一、民建、工商联工作重点的转移 (165)

二、邓小平与工商界负责人的谈话 (169)

三、工商界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

实践中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 (171)

第九章 调整职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建立与繁荣而努力

一、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183)

二、新时期工商联职能的调整 (192)

三、新时期工商联的性质、任务和作用 (196)

四、全国工商联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 (199)

五、积极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工作 (202)

六、“光彩事业” (204)

七、以中共十五大精神为指导，把工商界

的工作全面推向新的世纪 (207)

后记 (211)

第一章 利用、限制： 民族工商业的新生

一、建国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状况

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伴随着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社会的解体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鸦片战争前，在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我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才有了某种可能。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一些商人、官僚、地主、华侨、手工业作坊主，开始投资于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办了一些小型的机器修造厂、机器缫丝厂、面粉厂、火柴厂、印刷厂和轮船公司等近代工商业。这些工矿企业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

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后，就获得了初步的发展。特别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封建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人民进行的收回路权矿权、抵制洋货等一系列反帝爱国运动，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 1895 年至 1898 年间，出现了兴办近代工业企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的

棉纺织、面粉、缫丝、采矿、小轮船航运等行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1900年，我国的民族资本企业约有570多家，资本总额为6900多万银元。1905年至1908年间，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原有的各个行业都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并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如新建了一些水泥工业、电力工业，开办了一些银行，建成了400多公里长的铁路。到1911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已增至2300多家，资本总额达3.1亿银元，其发展程度已经接近或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水平。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改善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我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继此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各国忙于互相厮打，无暇东顾，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才获得了较快发展的机遇。同时，中国人民不断掀起的抵制日货的群众性爱国运动，也减轻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商品输出所造成压力。在此期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黄金时代”。据统计，这一时期新开办的资本主义工矿企业，1913年至1915年以每年平均增长41家的速度增加，1916年至1919年平均每年增加125家。其中棉纺织、面粉、卷烟、缫丝、火柴、造纸、制革等轻工业行业增长最快，矿产、冶炼、水泥、电力、机器制造等行业也有了显著的增长，新增资本幅度较大，机械化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卷土重来，大大加强了对华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短暂的繁荣发展瞬间即逝，又回到了深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军阀的压榨和排挤的局面，转入萧条时期。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造成了非常

不利的影响；从 30 年代开始，我国的民族工业又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长期侵华战争的严重摧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的发展采取极为残酷的压制政策，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更受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压迫和摧残，经常处于破产、半破产的状态。到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困境中苦苦挣扎，气息奄奄，濒临绝境。

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当时作为一种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其经历了产生十分艰难、发展非常曲折缓慢的发展历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旧中国，经济发展极其落后、缓慢，社会生产力水平也极为低下，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个体经济遍布全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作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的民族资本主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必然地始终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势力的压迫和摧残，只能寻求发展的间隙，求得有限的发展。这就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如：发展水平很低，在近代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不可能成长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基础十分薄弱，行业残缺不全，没有形成独立的发展体系，且基本上是轻工业，其中又主要是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严重缺乏重工业的基础，其所需的机器、车辆、船舶、钢铁绝大部分依赖于帝国主义；资金严重不足，有些民族资本经营的流动资金全部依靠借贷，资金不足引发的机器设备落后、生产规模狭小、商业投机性强等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新中国建立前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现代工业仅占 17%，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经营的工业企业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 1913 年至 1949 年基本上停留在 2%—3% 的发展水平上。1949 年我

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有 724 万人，包括农村在内，全国约有 4000 万人从事个体工商业，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8.9%。当时的个体工商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联系较为密切，从属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结构较为复杂，个体工商户规模小，资金不多，产值、营业额、利润都不高。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与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形成的。早期的民族资本家是由经营和投资创办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的一部分买办和买办商人、官僚、地主、商人、华侨商人、手工业作坊主转化而来的。随着 20 世纪初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了一定的独立地位，才成为我国社会一个独立的阶级。与此同时，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的资本实力且经营有多种工矿企业的大资本家。如状元出身的张謇，自 1899 年创办大生纱厂起，此后几十年间陆续创办了盐垦、面粉、榨油、机器修造、轮船公司等 20 多家企业，成为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大资本家。买办出身的祝大椿，投资创办了棉纺、面粉、缫丝、造纸、电灯等企业，资本总额达 200 多万银元。华侨资本家张振勋，在国内投资实业达 10 多处，遍及酿酒、路矿、棉织、玻璃、农牧等行业，仅张裕酿酒公司就投资 300 多万银元。还有一些退职回籍的封建官僚，尽管他们拥有的资产并不是很多，但却热心于创办工商企业，成为当地有一定影响的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头面人物。

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从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他们拥有的资金不多，所经营的企业规模也比较小，技术比较落后，只能使用中小机器，有的还甚至以手工劳动为主。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任何官衔，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联系较少或根本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强大的势力可以依靠。这些资本力量薄弱、企业规模较小、经

济和政治地位较为低下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构成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自从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之日起，它就存在有一种先天不足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和资本主义的两面性所决定的。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未能得到独立发展的时机，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阶级力量，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只能是一个幻想。与民族资本主义一样，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着与生俱来的两面性的阶级特性，即革命的进步性和妥协的动摇性。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方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①也就是说，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束缚，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矛盾，他们要发展，要反抗，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经历了漫长的曲折发展过程，始终没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执掌国家大权。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了1929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依附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外，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对革命保持中立态度或是中国革命的较好的同盟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又很快地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因而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获得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74页。

了一定的地位，参加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中来。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没有形成自己繁荣发展的独立体系，但却居于重要的地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据 1949 年统计，全国共有资本主义工业 12.3 万多户，职工 164.3 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 54.6%；生产总值 68.28 亿元，占全部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的 63.3%。个体手工业也占有重大的比重，其产值为 32.22 亿元，占全国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23%。私营商业尤为庞大，据 1950 年统计，全国共有 402 万户，占全国商业总户数的 98%；从业人员 662 万人；商品销售额为 182 亿元，占全国商业机构批发额的 76%，零售额的 84%。^①

这些统计数字表明，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将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产品还远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可以允许并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生产一部分产品，来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对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需要，维持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店员就业，减轻人民政府的就业压力，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城乡贸易，人民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增加国家的财政经济收入。同时，在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中，拥有着相当数量并有一定的技术专长和经营管理经验的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大量的熟练工人。在以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事业中，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和生产管理经验的优势。因此说，只要采取了适当的方针政策，就可以充分地利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并且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生。

^① 《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版，第 88—89 页。

二、新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政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标志着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频繁、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华民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中国社会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民主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就成为统一战线的一个新的重要问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①这个特点，决定了党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基本政策。

鉴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双重作用，并且由于我国经济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新生的人民政府在建国初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的政策。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曾多次对我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了民族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和特点，认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大资产阶级，也不同于外国的资产阶级，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在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我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① 是中国共产党的较好的同盟者，因而提出要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② 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深刻地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明确地宣布将“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但他们深受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的压迫与摧残，他们或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③

1949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规定了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我国经济各种成分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3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4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4—1255 页。

的状况，提出了“利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政策。会议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允许其存在及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在及发展，决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地任其泛滥。而是要在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以及劳动条件方面，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对其“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①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662人。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总结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斗争经验，特别是近28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愿，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政体组织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还规定了新中国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是一部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规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1432页。